

DOI: 10.3969/j.issn.1007-4074.2012.01.009

#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sup>\*</sup>

何小平

(吉首大学 文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题材;人类学诗学;原始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1-0046-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ZW022)

**作者简介:** 何小平(1970-),男,湖南新邵人,博士,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创作初期,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沈从文展示了一幅幅动人的湘西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画面,刻画了许多鲜活的湘西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沈从文用艺术和审美的方式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湘西文化,湘西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沈从文文学创作初期的湘西题材创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读者对一种异质文化的好奇,而是力图通过构建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来达成对现实的反拨、对现代文明的虚伪的批判目的。因此,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选择和利用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反思性和批判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属于地方性文化的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批判的文化思想资源来重视,沈从文是先驱者。沈从文通过他的审美创造,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文论等不同类型的文体中,提出了湘西地域文化、汉儒家主体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反思问题,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身处传统和现代变革之中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化的过程中,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使我们意识到,文化的求异性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文化同一化带来的危险。把湘西文化作为反拨现代

都市文化弊病的文化思想资源,沈从文的这种文化思考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内在精神尺度是契合的,这也是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根源。

## 一、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沈从文创作初期,其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特征,首先表现在内容上,是对湘西文化各种文化表现形态的展示,这些文化表现形态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在沈从文的初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发现很多的有关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正是这些地方性知识本身构成了湘西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这些地方性知识包括了湘西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的人性表现,也包括了原始宗教、少数民族的日常礼仪礼俗,以及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与各种口头文学、制作工艺等民间艺术样式。所有这些地方性知识,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也是湘西文化异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所在,这些也是湘西人的生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判断、

\* 收稿日期:2011-12-16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情感取向和审美趣味的独特性的形成根源。重情重形式,浪漫而厚重正是湘西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共同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湘西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性特征,本身综合了各种文化生活样式,将各种文化及艺术样式糅合在一起,共同孕育了湘西人的重情爱美的生命意识。在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特征的理解上,国内外学者大多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文学应该表达地方色彩方面,沈从文比当时的理论倡导者走得更远”<sup>[1](P10)</sup>。笔者认为,湘西文化系统中的这些地方性知识,是沈从文的文化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在众星闪烁的现代作家群体之中,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用湘西文化的这种地方性对抗着儒家理性文化的同质化,表现出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

地方性知识,是阐释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意在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系统以及独特的文化表达样式,这些具有独特特征的文化样式,正是反拨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化的必要的、可靠思想资源,反映了人类反抗文化同质化、追求文化异质化的根本诉求。从全球范围而言,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文化的同质化,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同质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同步进行,表现在西方的经济强权在全球范围内到处表达它的强势话语,推广、实施自己的文化模式,运用意识形态的渗透、文化输出,甚至用军事干涉,企图用自己的文化模式去全面覆盖其他区域文化,这直接导致其他文化的弱化乃至慢慢消亡。这种文化同质化的情况在国家之间如此,在国家内部的区域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撞,必然会出现强势文化运用自己的经济强势对处于经济弱势的民族区域文化进行挤压,形成了强势的民族文化对弱势的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这种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问题,在沈从文作品中有大量的反映,比如其小说《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就是对这种同质化弊病的象征性写作,小说控诉了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种罪恶,同时也说明了汉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同质化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措施,使边远之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了消亡,这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文化的同质化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文明多样性被毁灭的后果是严重的,事实上只有文明形态的多样化、文化样式的多元化才可能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怎样对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后果呢,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还有大量的思想家在寻找积极合理的方法,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矫正文化同质化的有效方法就是“地方性”(localize)——求异,不管它的结果是异中趋同,还是异中见异,抑或异中求异。在他们看来,尊重每一种文化样式中的地方性知识是表达我们人类宽容和相互理解的必须态度。只有深刻认识到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达到对各种事物的本质的深度认识。对文化理解来说,也只有尊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才能达成对每一种文化的本质的认识,才能真正去善待不同文化生活中过活的人们,这样也才能尊重他者。尊重了他者,也才能真正地尊

重自己。

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利用湘西文化来达成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逻辑上和人类学家运用异质文化来反拨西方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策略和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他用湘西文化中地方性的知识的“异”去对抗现代文明中的“同”,这样就大大地强化了湘西文化中异于现代都市文化中的文化特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异质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沈从文通过他的文学创作,保存了很多相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来说很不一样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包括了湘西文化生活中的种种类类与方方面面,比如民间礼俗礼仪,民间格言、艺术样式、宗教和信仰模式等,所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其本质都指向了湘西文化的精神本质,沈从文用文学的方式来达成对这些文化因素的理解和剖析,来展示湘西特质文化中的人们是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中相互协调关系以及如何向外人表现自己的。

首先,湘西文化生活世界中的人性的自然和谐、朴实真诚的文化特征构成了反观都市文明人性堕落的参照系数。文学是文化的一种主要的样式,全息地反映文化的各种蕴含,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核心思想是对于人性的思考,沈从文围绕人性,展开了对湘西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对比,在对比中透析两种不同文化的本质以及差异。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作品,反映了湘西的农业文化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充满温情的人之间的关系,淳朴厚道人格品性等,这些正是人作为“类”的健康的生活样式所必要的内涵,而这些充满温情的人性内容,在现代都市里显得那么的局促和稀少。沈从文对湘西这些充满温情的人性书写的目的,是要把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存续到现代都市文化样式之中,“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使它“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sup>[2](P5)</sup>。人性思考是艺术的重大主题,人性思考也构成了沈从文湘西题材处理的核心问题,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人性问题的重视——“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洁实,匀称,形体显小而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sup>[3](P5)</sup>

其次,沈从文湘西题材文学作品揭示了湘西文化中独特的社会心理。这是一种异于都市文明中特别突出的地方性群体心理。这些历史造成的群体独特心理体现了湘西人比较一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从而展示了湘西文化中自我认同、处理和他者关系的方式的迥异之处。我们知道,除了苗家、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要素外,湘西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有遗留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的古楚文化。巫风习习,娱人敬神;宿命而倔强,耿直赤忱;世世代代在这边远荒蛮之地所遭受的苦难隐于心而浸入骨髓,这种历史性的悲

苦、忧郁和苍凉之感显隐于举手投足之中,所有这些陶冶了湘西人的悲天悯人、大仁而大爱、重情爱美的心理与气质。

再次,湘西文化中独特的宗教。湘西文化中“雷神山鬼,娱鬼嬉神,事出有因,巫风习习,法术诡异”<sup>[4](P157)</sup>。这些宗教合成了湘西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也包括了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格调特征、道德和审美的风格及情绪,也更表达了湘西人的世界观,即他们所认为的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图景,也体现了他们最为全面的社会秩序观点:“在宗教信仰与实践中,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之所以表现出合乎理性是由于它被证明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地适应了该世界观所描述的真实事态;这个世界观所以在感情上有说服力,是由于它描绘成一种反映真实事态的镜像,这种镜像情理精当,符合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相互对应和相互确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一方面它使道德与审美倾向客观化,将它们描述为隐含在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世界里强加的生活状态,描述为得到不可变的现实格局支持的纯粹常识。另一方面,它支持了那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信仰,唤起深藏的道德与审美情感,作为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些信仰的真实性。宗教象征符号在具体生活方式和特定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了基本的一致,这使得双方各自借助对方的权威而相互支持。”<sup>[5](P103)</sup> 沈从文笔下的带有地域性的独特的宗教知识体系正是湘西生活方式生存的确证,是湘西文化特质的浓缩。

另外,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中,用文学的手段记录了湘西文化中的宗教及信仰仪式。我们知道,仪式是承载情绪、感情以及经验的意义的方式,具有公共性,它们傍生宗教信仰、神话等而不可分。仪式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文本,里面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比起日常生活中的‘秘而不宣’、‘半充分言明’以及缄默的意义而言,仪式是较为集体和公开地予以‘陈述’的事件,因而具有经验的直观性,因而对仪式的描述和分析早已成为建构民族志文本的主要工具。仪式作为一种将社会的强制性标准转换为个人的意愿,创造社会化情绪引起角色转换,提供治疗效应,制订社会行动的规范。”<sup>[6](P92)</sup> 沈从文有大量的作品记录了湘西文化里面特征鲜明的宗教和信仰仪式,比如《风子·神之再现》以及《神巫之爱·晚上的事》,对湘西苗族的娱神驱厉宗教、信仰仪式进行了深度细描。在这些作品中,苗族的“还傩愿”形式、程序及细节描写详尽,也比较细致地记载了巫师作法事的道具(牛角、钢剑和缙帛做成的法物),还准确地记录下了每场法事的时间,也明确界定了巫师和法事主人的关系。程序历历在目,苗族巫师开始颂赞天神,准备迎神从天下降,巫师助手引喉唱歌娱神;在场男女老幼三百人也齐声合唱。在内容上,娱神戏剧表演各种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寻夫和苗民的古代洪水故事。沈从文认为,在湘西苗族文化中,“还傩愿”这种宗教、信仰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各种审美和艺术形式,能集中体现湘西的文化精髓,比如“还傩愿”中的娱人敬神的歌,跟楚辞同样温雅。沈从文通过对湘西文化中带有鲜明地方性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的考察和描述,展示的是湘西文化的浪漫精神特质,这些带有

原始意味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孕育了湘西文化中热爱生命、张扬个性、重情爱美、善幻想、重形式等一系列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正是湘西文化精神中最为内核的文化因子。

## 二、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中的原始主义倾向

沈从文在初期创作阶段中,用审美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乌托邦世界,把异质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用来审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病,沈从文在寻求文化重建的思想资源时把目光投向了边远之地的湘西,因此说,沈从文的初期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原始主义色彩。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特征具体体现在他的原始主义创作倾向上。

回归人类原初的淳朴和简单,寻找人类健康、合理而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样式,这是原始主义思潮的出发点。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原始主义思潮本身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它的基本宗旨就在于通过批判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以达到追寻人类的健康和理想的文化生活样式的目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目光是向人的内心或者人类的原初状态。“广义而言,原始主义是指一种尚古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反映人性的一种基本情感和特征;狭义而言,原始主义是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以原始批判现代为主要特征,它或者重新塑出原始人的心态和情操,或者运用神话的想象方式表现原始主题。”<sup>[7](P23)</sup> 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相反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因为人在主体性极端膨胀的情况下面,科技理性得到了张扬,引发了人自身道德水平的下降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再,人内心的那种幸福感难得持久。为了审视这种自然破坏和人性失落的情形,原始主义思潮在艺术上的反应就是力图通过审美的方式,维护人的感性生活,表达人类对人和自然的原本具有的和谐状态的诉求。原始主义的基本动机,就是在寻求人类理想的健康文化样式的根源。作为艺术的重要样式的文学,必须担当起文化寻根的重任,所以原始主义创作应运而生。当然,原始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对人类精神的呵护上,具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在追寻人的生存本真化状态的终极目标上,浪漫主义和原始主义于是达成了契合。因为随着现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功利性宗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扭曲了自身的心灵,分裂了人格,人性的失落、人与人关系全面恶化就成为了常态。为了纠正人类文化生活中成为常态的各种异化样式,克服人类的各种扭曲异化状态,审美和艺术责无旁贷。沈从文作为中国 20 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其湘西题材中的原始主义倾向是其浪漫主义创作的典型实践范式。

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去重审视人原初状态下的本真简单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即使面对近现代湘西文化在应对外来文化的侵扰而出现种种变异



时,他依旧努力去挖掘湘西文化在变异中所保留下来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因素,诸如湘西文化中的人性的淳朴真诚、浪漫热情等。在现代文明和湘西区域文化之间的价值判断上,沈从文并不是在做一道“二选一”的数学题,他并不是把湘西文化看作唯一的健康的方式,其原始主义倾向在主观上也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因为沈从文在跨文化的生活经历中,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对他心理的高压,也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沈从文力图用湘西的文化资源来营造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境,来反观现代文明的弊病,企图用原始的淳朴真实、浪漫热情和活力,哪怕是一种自然野性,也能够成为反拨现代文明弊病的思想资源,来达到改造现代文明而更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的目的。所以,原始主义创作倾向是沈从文文化反思的一种必然选择。

### 三、沈从文人类学诗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沈从文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的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沈从文本人所接受的人类学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当时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沈从文通过很多途径也自觉地吸收了一些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曾深入地梳理与分析了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接受情况,在其沈从文研究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里,金介甫专门用“科学人道主义: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人”一节,讨论了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来源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种种表现。沈从文的人类学思想的接受状况比较复杂,其中对沈从文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周作人本人多方面接受了西方人类学知识,并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内推广,影响了很多人,沈从文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由于周作人的影响,沈从文还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人性原初向度的挖掘,面向人的内心深处挖掘出人性的原初本真状态。在人类学思想的指引下,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人类学诗学特征的彰显成了必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审美与艺术本身以及文化领域方面都有及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提供的启示

首先,沈从文本人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沈从文研究本身的视角的拓展提供了启示。文学与人类学二者之间,不可分离。二者共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人类是二者共同的本体。而文学是具有人类性的,因此天生应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而言,人类学不但要研究人类杰出的文化理解,而且特别要研究初始的、蛮荒的、野性的形象性思维和现代文学的关联。这因为“起源”最容易显露“本质”,“开始”能够预示“演变”。流发于源,本生于根,文学人类学应对文学和人类学进行贯通。另外,从文学对人类学的影响而言,文学里有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人类学材料,其意义与功效仅次于“田野”,这正是叶舒宪所提倡的第三重证据法。文学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具有文

化承载的功能,那么把文学、文献文本的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互动。<sup>[8]</sup>既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人类学诗学色彩,那么我们在探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应该多点文化自觉意识,多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真正地把握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以及艺术创作思想。

其次,对文学创作题材选择的启示。文学在两个方面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一是在文本的写作上吸收了人类学写实的手法,另一方面是在文学内容上出现了大量的异族叙述异国情调和异域内容。为了寻求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本真形态,在人类学走向异文化和荒远绝域寻找文化资源的时候,一些文学家也有了非常相似的精神追求,沈从文即如此。沈从文通过艺术和审美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审美乌托邦的湘西世界,来对抗都市现代文明与儒家理性文化的虚伪与堕落。沈从文人类学诗学特征最明显的是他的异域题材的选取。许多选择异国异域题材的作家描述了许多异域异质的人生图景,把这些人生图景作为他们在所处的恶劣的现实环境的反观之镜。异域题材作家离开近在咫尺的现实,把自己理想的正面投向远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化他者当作他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对照:“他仿佛怀着一种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信念:在异国神秘莫测的朦胧气氛之中找回因异化而失去的近处的家庭般的温馨,由此就不难解释下述并不少见的现象:异国题材的作家瞥见异国情景便浮想联翩,就如回到久别故土的早已熟悉的田野,……在异国神秘莫测的黑暗之中,重新获得这种家庭温馨。”<sup>[9](P124)</sup>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中湘西题材的选择不是仅满足了许多人对湘西文化的好奇,更主要是把湘西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反观之镜来反思现代文明的弊端,那么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在题材选择上的特征也符合了现代文明批评的需要和文化反思的需要,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的原始主义倾向,契合了中国当代寻根文学追寻文化之根的基本诉求,我们不能断定寻根文学源于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创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判断,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为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思路,那就是“只要有家园,无处不乡土”,当人在现代文明中迷失自己精神家园的时候,这种精神家园的寻找与重建之路就是不可停留的。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构建就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人类精神之家实际就在我们人类内心里,人的本真、善良不灭,美就常存于人间。

#### (二)在文化上的意义

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营造了一个湘西世界的理想之境,这是一面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光之镜,在此镜中,我们能洞观湘西理想世界的真,人性的善,也能反观到现代文明、都市世界的种种堕落。当中国在种种危机中寻求自救时,很多的思想家都在思考,是全面西化还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是两条最具代表性的道路,很多的文化精英的思考都没有脱离这两条道路。当然,沈从文的

基本动机还是在于对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一种文化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复兴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沈从文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用感性的审美形式来做出应答,他的思考是属于审美性质的,而非政治实践性质的,当然不无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浪漫的诗意。

但是沈从文在寻求中国文化自救的文化资源时,他的视角是独特的,而且事实上他也寻找到了和上面两条道路具有根本区分的道路,他的文化自我更新或者说文化重建的资源来自于湘西古楚文化中的合理的具有生命力的要素。因此,如何克服民族文化危机建设新的文化模式的问题上,沈从文的思考异于其他人,是属于第三条道路,所以说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具有了极大的文化意义,他的湘西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文化的象征意义,沈从文所营造的湘西世界成了国家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文化资源,所以沈从文湘西题材中的人类学诗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思考是独特的,他的这种独特视角的文化思考有反过来又成就了他的艺术创作,所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独一无二的。

#### 四、沈从文创作初期人类学诗学创作的缺失及其突破

在沈从文早期湘西题材的创作中,从都市批判的目的出发,其人类学诗学创作中所构建的湘西世界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是对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寻,这种现象性的说明对沈从文来说,是审美的,也是形而下的。沈从文的这种人类学诗学创作本身也存在有缺失,缺失在于他初期创作中还缺少历史理性。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遭受到失败,因为湘西文化自身也面临着文化的转型,它本身也处在裂变之中。在沈从文创作初期,沈从文并没有完全达到对湘西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本身还缺乏对湘西文化的理性反思。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因为作为沈从文审美理想象征的湘西世界在对外来文化的侵扰下,自身也在失去原本的真实状态,健康的人性也在走向扭曲和变异,人性中神性的要素也如同都市文化一样走向了堕落,这种无言的痛楚实际上常沉浸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久久地挥之不去。

可以说,沈从文创作初期湘西题材的人类学诗学选择,是沈从文到北京后,身处巨大的文化冲撞的一种感情选择,沈从文在乡情之下,其湘西题材的作品构建的是一种对湘西世界的审美幻象,因此说,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沈从文文化困境的来源。在后来的创作中,沈从文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再去重审他

在创作初期所展演过的湘西文化时,他思考的核心已经是湘西文化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了,而不是仅仅是把湘西作为一种审美乌托邦的象征性世界了,此时已经说明,沈从文已经走出了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时的思想困境,比如《边城》、《长河》等作品,就是他的象征主义写作,关注的是湘西文化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全面转型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沈从文从湘西区域文化意识到华族整体文化意识的逐步归聚,他的文化思想在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深刻,他的文化思想的深刻性就体现在他的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上。特别是沈从文在他的创作晚期,即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立足于人的生命生存及其发展,对生命的各种具象进行抽象的哲思,这阶段沈从文的创作与理论上都以人的生命存在为起点,以人类为本体进行抽象抒情,关爱人类成为这个艺术家、哲人的生命的最后归宿。沈从文创作晚期,沈从文已经完全突破了其创作初期的历史理性的缺失,以人类生命的关爱为己任,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哲人思想的最深刻处,他如此诠释自己的人类之爱——“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类,解释得比任何人庄严与透入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浮着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sup>[10](P188)</sup>

#### 参考文献:

- [1] 杨瑞仁. 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论[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0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9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4] 刘一友. 沈从文与湘西[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 [5]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 文化的解释[M]. 韩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6] [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年代[M]. 王铭铭,蓝达居,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7] 方克强. 文学人类学批评[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8] 萧兵. 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J]. 文艺研究,1997(1).
- [9] [德]顾彬. 关于“异”的研究[M]. 曹卫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0]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1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粟世来)

(英文下转第118页)